

事件观

法袍立住 法官就留得住

秦珍子

也许只需再多一点耐心，新一轮司法改革就会挽住张伟告别的身影。但这位39岁的法官放弃了等待，择别了自己奋斗16年的地方。对他来说，辞职是蓄积已久的结果，因为“我没有另一个青春洋溢的十年用来试水”。

张伟不是一个特殊的案例。仅仅在他此前供职的法院，就有另外两名年轻法官几乎在同一时间选择离开。根据北京市高院院长慕平的说法，“法官流失”现象严重，近5年，北京已有500多人离开法院，特别是基层法院。

主动放弃铁饭碗，伴随着一声叹息。十多年前，张伟根本不会想到生命中有这次变化。这位彼时23岁的郊区法院书记员暗怀对大法官的崇拜，一边憧憬着紧握法槌那重落下的荣光，一边迎来了第一个司法改革五年纲要。

那是理想与现实最为亲密的时光，改革一刀刻出法官庄严的形象，连司法考试都透着人性的味道。然而张伟逐渐感受到环境的变化。那几乎是中国所有基层法官都必须面对的环境——谁都能把对判决的不满上膛，再向法官“开炮”，轻则言语辱骂，重则人身攻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愤怒的枪口根本对错了方向，面对来势汹汹的民众，法院解决不了问题，又不敢惹上麻烦。

和众多年轻法官一样，张伟感到理想受到了冲击。现实的困境是司法行政化带来的“审判分离”，让办案的人往往没有判案权，判案的人则并不真正办案，一个案子走到最后，有时要经过副庭长到庭长乃至院长的层层审批，还要面对社会其他力量的干预渗透。

它也带来了层级压力。法官的待遇与职务一一对应，如果不能当上一个“长”，那么，按照行业内的看法，“法官就是公务员队伍里的小萝卜头”，经济上没保障，社会地位也不受重视。

为生活的尊严，优秀的基层法官向往层级的上游奋力跻身；但如果他们如愿，办案一线又得面对年轻化、经验缺乏的难题。

对和张伟一样年轻的法官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挑战。梦想在呼唤，现实也在需索，甚至连日常工作也被“兑水”了。在法定审判职责之外，基层法官们还得为

了“单位的数据好看”去完成调研、宣传、论文甚至维稳的指标。

在张伟心中，存在感、尊严感和成就感被稀释了，16年的时光最终化作一封300字的辞职信和3张离职表格。

假如张伟们愿意再坚持一下，那么他们可以看到改革其实一直在进行。从2012年年底开始，广东佛山中院就推行了被称为“中国当下最大胆”的法院改革，

比如尝试终结“审判分离”，比如提高待遇，让优秀法官重回一线，甚至提议去掉“庭长”……改革虽遇到阻力和阵痛，但引得高层颇为重视。

就在不久前的7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通报了《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的主要内容，既坦言法官沿用普通公务员管理模式造成的问题，也提出了对策，以法官为中心、以服务审判

工作为重心的法院人员管理制度令人期待。

改革显露出制度保障的气象。原本，法官的身份就该如高山磐石一般崇高、坚定而独立，不受流水侵蚀。虽然在过去，它曾被各种潮流裹挟、挤压，但如今，它核心的价值与意义正在浮出水面并得到承认。

有人发问，体制外的人才市场活跃

极了，那么体制内的人才流动起来又有何不可？一线优秀法官的一时流失或许可以倒逼、加速改革，但长久的流失甚至缺位则可能动摇法院守护正义的基石。

拿什么留住优秀的年轻法官，又拿什么守护至高的法律理？或许，只需要把那件法袍高高地挂在阳光下，还它原本应有的独立、挺括和荣光。



7月21日，海南省文昌市，在超强台风“威马逊”受灾区长罗里农场，一个孩子站在自家的房子里。CFP供图

“特色”自杀率的“特色”下降

本报记者 宣金学

45岁的山东妇女张欢还记得自己5年前拿起一瓶农药的情景。“我不知道怎么就去拿了那瓶农药。”这个靠种地和捡拾煤块为生的女人说，“当时一定是疯了，我走过去，喝了一口，然后就失去了知觉。”

面对着经济负担、疾病困扰、以及社会压力，张欢选择了自杀以求解脱。她只是做了许多农村妇女在她之前已做过的事情。

新闻中能检索到的，还有上周发生在福建省漳浦旧镇林美村的一桩悲剧。35岁的年轻母亲陈英，在杀死年仅5岁和9岁的两个小女儿后，上吊自杀。陈英自杀的前一天，湖北松滋市红花村薛萍，因为家庭矛盾用斧头砍死丈夫后服毒自杀。

与此同时，城市和“自杀”有关的新闻也并不少见：官员、商人、媒体从业者、以及老人……“自杀”二字频频见诸报端。

可是，英国著名杂志《经济学家》最近刊文披露，近年来，“中国自杀率已跌至世界最低行列”、“近10多年来中国自杀率降一半”。而支持这个论断的证据，来自香港大学今年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

香港大学这份最新研究报告称，在2002至2011年间，中国的年平均自杀率下降到了每10万人9.8例，降幅达到58%。其中最大的转变在于35岁以下的农村女性，自杀率减少了90%。

“其实我对这个结论感到很意外。”该研究报告主要起草人、香港大学香港赛马会防止自杀研究中心主任叶兆辉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历史上还从未有哪个国家的自杀率出现过如此迅速的下降。”

“诡异”的现象

在企图自杀的日子里，张欢越来越郁闷。乙肝使她几乎与世隔绝。想给孩子盖房，经济却十分拮据，再加上与邻居发生宅基地纠纷，加重了她的焦虑。在一次晚饭后散步后，她决定自杀。

那一年，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一份数据称：在中国，自杀已成为第五大死因，且年轻女性的死因之首。

中国一个特别突出的、和别国不同的现象是，女性自杀率高于男性——这是世界卫生组织发表的报告《妇女和健康：当今的证据，未来的议程》一文强调指出的。

根据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的数据，1995至1999年间，15岁到34岁的中国女性公民中，每10万人里平均约有37.8名女性自杀，而其中来自农村者占比高达93%。

曾担任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执行主任、关注中国自杀问题长达20多年的加拿大籍博士费立鹏研究发现，“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农村自杀率是城市的3倍，女性自杀率比男性高25%左右”。清华大学公共健康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学系教授景军也向中国青年报记者介绍称，“从1987到1997年，农村女性自杀率曾明显高于农村男性自杀率”。

因此，不难理解国内不少学者和媒体人对香港大学的研究报告吃惊不已。

这份题为《中国自杀率报告：2002~2011》的论文称，1995年至1999年，15岁至34岁的中国女性公民之中，每10万人里平均约有35.2名农村女性自杀。而2011年，这一数字减少为每10万人之中只有3例，降幅超过了90%。该报告发表于德国《社会精神病学与精神流行病学》杂志。

其实，这个看似“夸张”的结论并不孤立。根据景军团队的统计，1998年之后，农村女性自杀率明显高于农村男性的现象得到扭转，至2010年，农村女性的自杀率已经较1987年下降了78%。

香港大学另一个2012年发表的有关自杀的研究项目，对山东省近20年间的自杀情况进行了分析，发现35岁以下农村女性自杀率下降了95%，全部农村女性的自杀率也下降了68%。

同年，整个国家的自杀率也在下降，《经济学家》援引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称，2012年中国每10万人自杀6.9例。

叶兆辉将之称谓“诡异的现象”。他向记者特别强调，出现这一变化的前提是，中国未曾为降低自杀率而推进心理健康服务，也并未动用官方手段对避免自杀进行大规模宣传干预。“这种下降不是建立在精神卫生科学的医生、设施等增加的基础上。”景军也强调说。

这让从事自杀干预研究几十年的叶兆

辉有些困惑：依照法国社会学家艾弥尔·涂尔干的流行理论，城市化、现代化和社会经济发展将导致社会成员相互疏远和更高的自杀率。

一些数据也表明这个理论在更富有的发达国家成立。比如，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2008年至2013年，全球平均自杀率从每10万人11.6例增长到了14例。而中国恰恰相反，并且中国周边的富裕国家明显存在更高的自杀率。

农村女性的“贡献”

中国自杀率的下降，最主要的贡献来自农村年轻妇女自杀率的降低。报告称，农村自杀率的下降影响到全国自杀率的下降；同时，农村自杀率的下降受到农村女性自杀率下降的左右。

“这也是中国城市化发展带来的益处。”叶兆辉表示，“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农村妇女自杀的可能。”

针对农村女性自杀率下降的原因，该报告着重分析了改变中国社会结构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即我国境内大批农民离开乡土到城市打工，包括女性的广泛参与。

1987年，中国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共1050万人，而到了2008年，农村外出劳动力达1.4亿。据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结果显示，女性在2006年的农村外出打工者中已经占到36%，其中年轻女性占绝大多数。

叶兆辉指出，人口迁移帮助农村女性远离了农村最简单的自杀方式：喝农药。据称，“中国农村75%的农药是一直存放在家里，不是特意为了自杀去买的，如发生和配偶吵架之事，农村妇女到家里拿农药就喝了，根本没有思考，其中62%”

张欢就是在家楼梯的背后，找到那瓶标着氧化乐果的液体农药的。这是她丈夫买来为棉花除虫的，在她企图自杀时，虽然家里已不种棉花，但还留着它。

氧化乐果是一种有机磷农药，不少人选择用类似农药来自杀。《世界卫生组织简报》2009年10月号刊登了一项调查有机磷农药与自杀意念关系的研究报告称，使用有机磷的地区自杀率较高，慢性有机磷中毒可能会导致抑郁和焦虑症，进而导

致与这些精神疾病相关的死亡。

该简报发布的前一年，世界卫生组织还发表了一份题为《急性农药中毒临床处理》的文件，宣传对象以决策者为主。

“农药的毒性下降也对降低自杀率有所贡献。”叶兆辉严肃地说。这一问题早已被关注。甚至有不少精神卫生学者呼吁对农药进行稀释。“这也是农药毒性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景军介绍说。

但他更为强调的是“离开”。对于许多出身农村的年轻女性而言，前往城市打工，可能面临种种的压力和困难，但即使这样，也比她们留在农村要好。

景军认为，个人的抗争是中国农村女青年自杀率高的最佳解释。这种抗争往往发生于家庭内部，同妇女地位、婚姻关系、婆媳关系、财产分配、育儿养老等问题交织。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自杀者在最近一年的生活状态和最近一个月内的重大生活事件与自杀致死的结果有着密切的联系。

以家庭暴力为例。一项有关家庭暴力的调查显示，在问卷所给出的4种选择中，47%的人选择了“丢脸”；38.2%的人选择了“无所谓”；12.7%的人有自杀的念头；9.8%的人内心有恐惧感。还有有的妇女什么也没有选，而是写上“不能忍受”、“想离婚”等。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出家暴在乡村文化中的不被察觉和被宽容。

报告认为，农村女性的迁移，使得她们在一年内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离开了既往的来自农村的普遍家庭纠纷，告别父母的压力，以及其他贫苦乡村里的生活压力，也包括远离农药。

新的忧虑

叶兆辉提醒，农村女性自杀率降低值得高兴，但这并不是中国自杀率变化的全貌。报告指出，推动中国自杀率下降的因素，尤其是人口的迁移和城市生活水平的提高，也越来越没有影响力。

大多数忧虑指向老年人的自杀率居高不下。如今，老年人口在中国人口中增长最快，每10万65岁到69岁的城市老年人中有9.9人自杀，每10万70岁到74岁的农村老年人中有41.7人自杀，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倍到五倍。老人自杀率在过去10年的头5年总体下降，城市比乡村下降更快，但是这个比率从2008年开始保持不变甚至回升。

根据2005年发表在中国《临床精神医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研究人员在调查了全国23个疾病监测点的数据以后，发现55岁以上人口的自杀死亡案例中，59.2%与患严重病或受伤相关，34.5%与经济困难有关。

“随着国家的老龄化和经济的发展，中国可能触及危险的转折点。”《经济学家》杂志评价道。

“其实就是稍微有一点干预，自杀干预可以有成效降低自杀人数。”自杀预防不是很奇妙的事情，要有人关心有人干预。

他举例说，德国一座大桥是自杀者的常去之地，后来护栏从齐腰高，增加到齐肩高，该地自杀率大减。

早些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心精神卫生中心一位研究人员，被派往西北几个自杀率很高的村子，他的出现使得几个村子的自杀率降到几近为零。“你是中央派来的，我们再不自杀就是丢地方的脸。”村民常这么对他说。

然而，当记者拨打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8个城市的自杀干预热线电话后发现，不少已经变成空号。杭州一家当地媒体报道称，自杀干预热线开通9年却陷入尴尬：心理问题越来越多，打热线的人却越来越少，其中健康咨询类占了33%之多。记者拨打了深圳市自杀干预热线，电话那头一个甜美的女声表示，很少有农村女性来做心理咨询。

幸运的是，张欢在喝下农药后，没有成为那62%的抢救失败者。她立即被发现并送往医院，活了下来。至于未来是否还会有自杀的念头，她不敢思索地否定说：“太贵了。”这个黑瘦的农村妇女表示，“上次住院和急诊就花了13900元。”

她摇摇头拿出一包收据：“如果你是企图自杀，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一分不报。”

(文中张欢、陈英、薛萍均为化名)

新闻眼

陈卓

意外的零分

面对这条新闻，你其实很难决定是该板起面孔看完，还是咧开嘴一笑而过。

因为给学生的期末成绩打出91个零分，华中农业大学的李厚刚老师，让一门普普通通的思想道德修养课，成了网络上的热点新闻。

虽然他对期末考试的要求，只是用14周完成一篇读书报告，但这位教了12年课的老师想不明白，为何近年来抄袭的现象有增无减。去年他教授的300名大学生中，“只有35人抄袭”，而今年上课的500名大学生中，抄袭的人数竟增加到91人，其中有两入抄的还是小学生作文。

看上去，为维护学术道德对学生痛下重手的李厚刚，换来了助威声一片。学校教务处表示对李老师“用严规守住师德底线”的行为“完全支持”，BBS上的学生讨论热烈，说“应该欢迎这样的较真”。

但实际上，李厚刚得到的可不全理解和支持。一些学生觉得，老师明明是拿“在大学里太正常”的事儿“故意为难学生”，有人认为“这是在背后捅刀子”，还有人李厚刚本人进行了人身攻击。在成绩公布以后的十多天里，这位老师甚至和“一批学生关系紧张”。而当记者走访了当地十几所大学的近百名学子之后也发现，这些抄袭者其实并不难找到同道中人。

原来，司空见惯竟能成为颠倒善恶黑白的原因。看来这一次，要不是91个零分的叠加和大学生抄袭小学生作文的噱头，很难说这件事到底是狗咬人的常事儿，还是人咬狗的新闻。

糊涂的培训

都说道理越辩越明，可偏有一些奇怪的课堂，让人看罢越发糊涂。

虽然课程早已公之于众，但66.8万元的高昂学费，记者探访所得的官商混招的现实，还是让北大的后EMBA班陷入重重迷雾中。

推荐3名企业家学员，官员学费可获得减免的优惠政策，让人们怀疑“官员请客，企业埋单”的惯例，偷偷化了个妆便在大学扎下根来。每个月上课两三天，两年内安排国内外游学考察的课程设置，让人们开始思量这是不是只为了“带你玩儿”……在网上网下越吹越劲的反腐风暴中，北大的这个培训班就这样被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当成一个样本供人观察。

不过，即使围观者众，这培训班依然不愿揭开自己的面纱。主办培训班的北大信息科学技术学院说，这则“66.8万元培训班一半是官员，要求正处级以上”的新闻中，“只有学费信息与该项目一样，其他内容均与该项目不符”。而那在网上早已公布的招生简章算不得数，因为这网站“不是北大建设和管理的”。

这下看起来没有问题了，学费依然昂贵，可清一色的商人中再难以滋生出人们的种种猜测。不过让人尴尬的是，还有较真的记者，再次来到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的办公楼内，探访这一高端培训项目，从招生老师那里得到的，依然是“政商比例是一半一半”。

看起来清晰的答案再次模糊，到现在依然没有人知道这个花费66.8万元的培训班到底在做些什么。在我看来，这面目模糊的培训课，不如就从如何诚实回应公众质疑说起？

被抵制的专业

虽然我们已慢慢习惯了人们对于自己所学专业的吐槽，但这一次医学面临的，看起来是更真实的抵制。

最近，当医学专业网站丁香园向3860名医务人员发放问卷，调查他们对于女学医的态度时，发现竟有58.0%的受访者会力阻自己或亲友的子女报考医学院校，仅3.0%的受访者建议自己或亲友的子女学医，其余36.2%持中立态度，遵循子女自己的意愿。

遭抵制的医学专业还没有就此没落，招生办的老师说“最受欢迎的是临床医学专业”。在校的学生说在这里“只要你够努力够勤奋，业务水平够好，没有人会瞧不起你”。可是，那一组数字却告诉我们，与热闹的景象并存的，还有另一种现实。

医院的主治医师由于了解“医生收入与支出不成正比”，而在孩子学医与不学医之间思考很久，医患系科的主任则由于目睹了太多医疗纠纷和医患矛盾，觉得这行“危险极了”，坚决不同意女儿学医。记者在包括155名学生的4个本科班级中发现，父母是医生的学生只有15人，仅占9.68%。

现实世界里的医患问题正在投射到校园之中。医学专业热门土壤里，有一些种子已悄然埋下。种子能否破土而出，尚没有人知道，但若我们只是静待这种子慢慢发芽，损害的恐怕不止医学这个专业。